



历史与叙述

孟悦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编 编 委	汤学智	杨匡汉	张德祥
	汤学智	杨匡汉	张德祥
	许 明	周政保	洪子诚
	孟 悦	楼肇明	贺兴安
	畅广元	李 星	肖云儒
	傅美琳	田和平	王志章
	邓晓丽	孙 玲	符 均
	鲁小红	张 艳	

总 序

当 90 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 80 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洒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 80 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年代,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年代。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有价



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新时期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岁月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这套小书,有多数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哪怕它还很不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在一些具体的学



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地区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某些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和玷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梳理问题的角度,对当今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90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80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和滋养,让“新世纪”文学之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2000年的到来!

1990年春于北京



再版弁言

七年前,《新世纪文丛》得以出版,相继获中国图书奖、金钥匙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图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文学所十年科研成果荣誉奖等五项重要奖项,对作者来说确属意料之外。我们只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对新时期文学事业负责的态度,以平常之心,以尽可能公允之心,做了一项勉为其难却又不可推卸的工作。如今能得到社会和读者的一些承认,这是我们深感欣慰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以“追新”、“弃旧”和“求异”三向并发的姿态与气势,从思维方式到艺术方式发生了种种与时代共脉搏的变化。举凡关注现实的人们,都会感受改革开放的风气对文学的抚爱和沾溉,都会体悟文学苦旅的艰难以及它所带来的经验与不足,也都会深切地确认,如今的文学世界已不再是群趋偏峰或单一中心的年代。迎向新世纪的文学,处于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里,既在历时的意义上与历史对话,又在共时的意义上与他人交流。对话和交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种制造否定历史话语或者把一己之见视为历史神圣而动辄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现象,终将受到历史的嘲弄。新时期文学发展和走



向繁荣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从历史和现实的深层所产生的时代精神是厚重、沉甸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也只有在对话和交流中，在把握历史脉动和现实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其足以走在前沿地带的可能性。

编辑与出版《新世纪文丛》，实际上还是寻找在文学发展中培育理论生长点和更新学术观念的过程。当今社会，需要多一些真正的观念型的文化人和批评家。他们应有对种种现实问题的超越性思考，有对流行价值观念的批评立场，有对责任、理想和使命的文化自觉。社会在走向多元化，批评与研究自然也该是多元的，让多种清音齐鸣。我们深知，在这世纪之交，任何个人、任何学派都不可能完全占据真理的全部空间。因之，宽容精神的彰显、人格情怀的到位和学术个性的坚持，理应并进于批评与研究过程中，合理的见解将受到尊重，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应当休息；任何识见的精当和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历史来甄陶，由时间来确证。这也是我们进行编撰的基本理念和心态，恳望得到读者的理解。

这套《新世纪文丛》七年后再版，因时间的推移和认知的加深，其修订乃至增删当属必然。我们力求保持整体的原貌，充实必要的内容，并使思考和表述更缜密、更准确一些。自然，原丛书中个别质量欠佳的书册，为了保持丛书的整体水准，不再予以重版，既是无奈却又必需。

新世纪的钟声已在不远的前方隐隐敲响。每个时代都有理由根据当代人的眼光来阐释文学走过的旅程。但愿这



套丛书的再版,多少能为新时期文学被人们接受、认同与确信,提供某些必要的见证。路还长,虽每每念兹而临深履薄,朝乾夕惕,然而一切不放弃以崇高品格对待所钟情的文学的人们,总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前行。文学的未来是属于新世纪的。

1998年立春 北京



目 录

- 001/ 引 言
- 001/ 第一章 孤独历史中的故事
- 013/ 第二章 “铁屋”开裂时分的故事
- 014/ 历史与“读史者”
- 020/ 曾经有过的历史形象
- 025/ 废墟上的“复乐园”
- 033/ 石头本身不像石头
- 041/ 第三章 恻隐之心与历史理性
- 042/ 愿望的故事
- 049/ 批判的叙述
- 054/ 走出乌托邦



- 058/ 叙事的“瞬间”性
- 065/ **第四章 文人体验中的中国生存**
- 066/ 连续与断续
- 071/ 语言缝隙:主语与主体位置
- 077/ 谓语,文化象征
- 082/ 宾语,叙事过程
- 085/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
- 087/ **第五章 荒野中弃儿的归属**
- 088/ 叙述:两极间的结系者
- 097/ 故事:逃离荒野
- 109/ **第六章 记忆与遗忘的置换**
- 110/ 看、被看与主体
- 119/ 回忆、记忆、历史与生命
- 125/ 表象、上帝的契约
- 130/ **第七章 从历史的拯救到历史的诊断**
- 131/ 讲故事的人
- 134/ 传说与历史的瞬间
- 140/ 重复:固置与转移
- 145/ 语言的施暴与反叛
- 152/ 精神分析的辨证

引 言

“历史多方面、多色彩地塑造了我们”^①——人，而又
是人自身构成了历史。历史规定我们，规定着我们的话语，
而又是我们以自己的话语宣布着历史的规定。历史借助或
利用我们完成它伟大的故事，而又是我们记录和讲述着历
史，把它变成我们的叙事。人类的生存产生并面临着无数
难以超越的根本窘境，历史与叙事的二难推理便是其中之
一。然而，作为人，我们只能直面这一窘境而别无选择，因
为我们并非不死的神祇，而是永羈于生老病死的生灵，除了
带之不去的身外之物，历史与叙事——我们置身其中的那
个伟大故事和我们创造的有关那伟大故事的故事，乃是我
们这些生死交替的人所有的全部。我正是因此而选择了历
史与叙事这个题目。

显然，这是个大而无当的题目。首当其冲的难点是，关

^①保尔·利科语。见路易·加迪等著：《文化与时间·导论》，郑乐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于历史与叙事的观念和界定几乎像历史与叙事本身一样丰富。为了不致落入概念范畴的陷阱,有必要清理一下几个技术性范畴的理论背景。

首先,我接受这样的理论,即作为文类的“历史”并不等同于事件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曾经存在,但并不应声而至,留下的乃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记述的记述。因此,我倾向于用“历史写作”、“历史叙事”或“历史性记述”称呼这一文类,以便区别于“历史自身”。

其次我以为,叙事并不是一个受文类限制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叙事可以视为一种超文类、跨文类的文体。然而叙事无法超越的惟一限制只是意识形态。叙事总是意识形态性的叙事,它与历史(历史本身)的关联也总是某种意识形态性关联。

本书将在第一、第二章就广义的以及“文学的”叙事与历史之关系作一些理论性的宏观探讨,然后,将具体分析几位新时期小说家的创作和作品,寻找其叙事与历史发生关联的独特方式,以求将叙事与历史的问题引向具体和深入,或曰引向“大写的历史”本身。

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之轮本身的转动,各种文学体裁和形式皆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力、潜能和前景。正如新时期的历史现实不同于“文革”、“十七年”、解放战争或五四时代的历史现实,新时期的文学也并非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传统的简单延续。可以说,新时期的来临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片全新的、也是历史的文学现实,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全新的现实使我们的文学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新时期



文学以它与以往文学在视界、认知、感受、思考与表述方式上的差别、变异与延续,重新展示了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线索和图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文学工作者,我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本书的写作正是为了直面一个由新时期的历史和文学所提出的问题,即文学(叙事)的形式与特定社会历史内容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小说叙事在形式上的重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新时期的许多小说不再以我们熟悉的五四文学或“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的既成方式传达社会及历史的信息,这现象甚至在“新形式是否‘脱离’现实”的问题上引起不少争议。这只能说明一点,即我们对“新”的文学形式及其与意识形态、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茫然无知,或知之不多。在我看来,如果承认“文革”文学形式的“假大空”性,那么则也应承认,“文革”之后新形式的涌现倒可能容纳更丰富的历史内涵。至少,这些新形式的出现本身就已是历史的结果,它们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只能深植于历史本身。只是,它们与历史本身的这种密切关系尚属我们文学研究的未知领域或无意识领域。我以为,探索这片未知之域,揭示这种无意识,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

第一章

孤独历史中的故事

在众多的“语言”门类中，从诗歌、散文、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电影到哲学及政论时评，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地“读出”某种“叙事”，而唯有当它们被读作“叙事”时，它们与历史的关系才最为密切。

叙事不是命名——给事物一个名称。叙事不是下定义——给名称一个意义的规定。叙事不是真理的断言，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叙事不是事实的直陈或宣布，如“七年春公伐邾。”叙事不是要给你没有或未知的东西，如一门知识、一种学问、一种思维方式，而是要给你只要活着便已有或可能有一切，给你一个世界、一种生活、一种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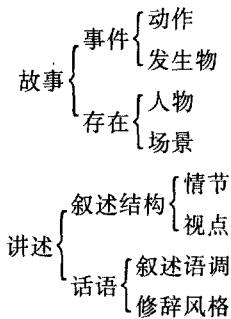


望实现的例证、一段生命体验。简单地说,给你一个故事,或故事的讲述。当然,这个“世界”、这段生活和体验,这一愿望的旅行,这一故事及讲述只以“形式”存在。而提到“形式”,则叙事的形式不是第一或第三人称,不是倒叙、白描或意识流,不是隐喻或转喻,不是色彩、透视、造型或摄影机位及其移动。唯有当这些技术性的手段构成故事或故事的讲述时,它们才成为叙事的形式,成为叙事形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既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可以临时聚合的形式体系,又有着相对严格的一定之规和结构原则,那便是西·恰特曼曾经概括的故事与讲述的原则。^①

这里我不拟对叙事的起源及其与历史的关联作考证式的探掘,让我们从一则神话分析入手,观察叙事从历史中的最初萌生。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

^①在《故事与话语》(S·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中,S·恰特曼曾将构成“叙事”的各种因素归纳成图表:



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与“女娲地出”等神话不同，这一神话不是一则记述，而是一种叙事，不是陈述一个实有或拟想的事实，而是叙述一个拟历史：浑沌如何变成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它并没有像《圣经·创世篇》那样，将宇宙万物的起源归结为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如果说它多少解答了宇宙天地的来历，那么这宇宙来自于浑沌莫名的生存的最终赋形、获形——从浑沌到秩序而成为宇宙。从浑沌到秩序既是一种空间获形，又是一种时间、历史、叙事的获形。如果说“浑沌如鸡子”表达了一种无形、无时的状态，那么“万八千岁，天地开辟”的事件则从这无形无时的浑沌中，产生了时间、空间及形式本身。因为这里的时间（“万八千岁”）不是普通的历法时间，而是一种象喻性的拟历史时间或故事时间，它伴随、标志了一个有意义的“天地开辟”的巨大事件，又引入了另一些后继事件（如“后乃有三皇”）。这里的形式（如阳清阴浊）也并非一般的形式，而是形式的统称，它不是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存在，而是相对于“浑沌”的存在。时间和形式的诞生和开端也就是天地的开辟、宇宙的开端，而这也便是一切的开端，是“开端”本身的开端，它并不相对于结束而存

在,倒是相对于“无始”、“无端”而生成。只是在这有形的时间、空间和“开端”的开端之后,才有了变化发展,有了生存的接续和扩大——有了与盘古的生长相伴生的“日高”、“日厚”的天地,有了又一个“万八千岁”后的秩序样态,有了“三皇”,有了知——数的规律,有了“史”本身。

这则神话性的历史叙事把宇宙的生成描绘为一个情节,一个“浑沌”和“绵延”最终获形的情节,一个“时间”、“形式”、“开端”、“发展”和“后效”等等连续性的观念本身得以诞生的情节。然而值得分外注意的是,这些从“浑沌”中剥离出来的、构成宇宙的历史的观念也正是构成故事——情节自身的基本观念:即原发情境(混沌)、开端(万八千岁,天地开辟)、发展变化(天地日高日厚,盘古日长)、后效及结果(后乃有三皇;故天去地九万里)。这神话描述的不仅是“宇宙从浑沌中产生”的情节,同时也是一个“情节”本身、叙事本身从无始无终、无名无形中“产生”的情节。换言之,由于喻示了形式、时间、开端、发展以及后效等概念本身的出现,这则神话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相关的。从浑沌到获形与其说是宇宙的诞生过程,毋宁说是叙事自身的诞生过程。浑沌与有形的关联相当于历史与叙事的关联:叙事正如宇宙从浑沌中生成那样,从历史中生成。

实际上,在这则神话中,正是最初的“浑沌”形象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处境有着密切的相似性。请注意“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意象。浑沌而封闭的空间,囿于这空间的人,这乃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有的一种世界图象,带有我们民族特殊的历史性。与《圣经·创世篇》不同:

